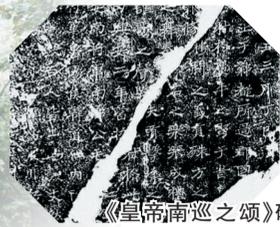




挑灯小语

颂：古代的主旋律

霜枫酒红



《皇帝南巡之颂》碑

颂，作为一种古代文体虽然已经鲜有使用，但是今人并不陌生。对于颂的认识，相当多的人源于中国最古老的诗歌总集《诗经》。《诗经》是对中国人的艺术、生活等多个领域产生深刻影响的文学作品集，“风雅颂”“兴比赋”是中学课堂上必然要讲到的内容。因此，可以说《诗经》属于国人的集体记忆。

按照《毛诗序》的观点，颂是“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南北朝时期著名文学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颂赞》中概括为“容告神明谓之颂”。不过《诗经》中并非所有的颂诗都符合这个定义。周、鲁、商三颂在文体上存在差异，孔颖达认为《毛诗序》中关于颂的定义，所指“唯周颂耳，其商、鲁之颂则异于是矣”。按照孔颖达的说法，商颂虽然是颂德祭祀之歌，但不告成功；鲁颂只是颂德，既非祭祀，也非告成功。周、鲁、商三颂的共同性在于都是美盛德之形容，故孔颖达称“颂者，美诗之名”。

用颂这样的文体来赞美盛世的观念和传统由来已久。郑玄《诗谱序》说，“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礼作乐，而有颂声兴焉，盛之至也。”“制礼作乐”和“颂声兴”都被视为太平盛世的特有事物，因而礼乐与颂声便与太平相关，成为盛世的标志，也成为盛世叙事的元素。西晋挚虞在《文章流别论》说：“古者圣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颂声兴。”

按照传统观念，颂声应该感于盛世之气，是一种类似自然感应的自发行为，非人为有意而作；然而另一方面，统治者

为了营造盛世气象，基于颂声为太平标志的观念而有意推动颂声的创作与传播。这就使颂声逐渐演变成人为有意之作，甚至根据上意粉饰太平，为帝王的行为涂脂抹粉。例如，唐开元十一年（723）玄宗李隆基过黄河北巡，诏曰“缘路州县，有表荐官僚及上书献颂者，中书门下审覆奏闻，量加进赏”。皇帝奖励献颂，其意义就在于兴颂声，以颂声赞美盛世，以“颂声咸作”证明当代为盛世。

随着帝王通过兴颂声有意营造盛世景象，人们自觉地认识到盛世作颂是人臣的义务与责任，人臣应该润色鸿业，用“主旋律”的文章辞藻参与盛世的建构。于是，人臣赞美盛世就成了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的盛世叙事传统。不过，对此也有不同的观点。汉代的王褒在《四子讲德论》就借微斯文学和浮游先生之口展开讨论。微斯文学代表反对作颂的观念，认为贤臣应该以实际行动帮助君主建立一个理想的太平社会，但不必以作颂的形式宣扬君主。浮游先生则主张为君主作颂，衰世作颂，人臣虚美，是不当的，但太平盛世理应作颂，不作则是鄙陋。

南北朝时期另一位著名文学家鲍照延续了盛世人臣作颂的观念，还将汉赋纳入颂的传统。由鲍照的观点和创作可以看出来，虽然魏晋后社会动荡、战争频仍，但人臣以文学艺术的方式讴歌帝王已经深入人心，“斯乃臣子旧职，国家通义，不可辍也”。到了隋唐，人臣同样认为作颂并非仅是个人的行为，而是不可或缺的“有国彝典”。例如，王勃《上九成宫

颂表》说“灵化不言，功成则颂显”，就是要靠作颂来显扬帝王功业。

灵丘觉山寺有一通《皇帝南巡之颂》碑，该碑的书法代表了北魏前期皇家水平，被研究者誉为平城第一碑。南巡碑铭记的是北魏和平二年（461），文成皇帝拓跋濬巡视太行山东麓诸州返回平城经灵丘时与随从众臣数百人在笔架山竞射后刊石勒铭。这篇15个世纪前的颂文，赞美了国运昌盛文成皇帝效仿汉族皇帝举行契礼，刘宋政权使者北上向文成皇帝朝贡，文成皇帝南巡途中问民疾苦、颁布养老政策，百姓感恩皇帝到处是“讴歌之声”“击壤之欢”。

《皇帝南巡之颂》还描写了在笔架山前的君臣竞射，仰射山峰，“数百人皆出山数丈”。因为石碑破损文字不全，参考《魏书·高宗纪》记载：“灵丘南有山，高四百余丈。乃诏群臣仰射山峰，无能逾者。帝弯弧发矢，出山三十余丈，过山南二百二十步”。对比《皇帝南巡之颂》与《魏书·高宗纪》，关于君臣竞射结果的真实性应该说前者更可靠。不过，整篇颂文还是明显地褒扬了文成皇帝的文韬武略、宏大功业以及国运昌盛。

在古代的盛世叙事传统中，颂是歌颂盛世的文体，也被视为盛世的表征，因此在古代的文体秩序中颂处于极高的位置，可谓一种神圣文体。到了现代文学观念中，颂就不再是一种文学文体了。不过，作为中国文学的一种基因依旧存续在写作之中，有时甚至出现回潮，装点粉饰、缺乏情志等流弊亦会被批评。

一群孩子的战斗

影片《战歌行》是一部以抗战背景下胶东“孩子剧团”为创作原型的红色题材影片。故事的发生地是胶东，其山情海韵自然是影片中展现最多的场景。远山、海浪、水鸟、沙滩、朴素的海草房、晚归的打渔船。剧组为了能够真实再现20世纪30年代胶东小渔村的景观，特意在影片拍摄地海阳搭建了一座座海草房。观影厅里，不时有阵阵涛声涌到耳边，让我们隔着银幕似乎都能闻到海边那腥咸的气息。

静谧的海边小村只是《战歌行》故事的自然环境，抗日烽火，才是历史大背景。其时，七七事变已经爆发，日寇的铁蹄已踏破了东三省。为了宣传抗日，贺团长带领“孩子剧团”走进渔村，用唱歌和演戏的方式开展工作。在积极抗战的掖县，村民们将剧团的孩子领进家中，保护他们的安全。“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这是“孩子剧团”的歌声与呐喊，这是所有民众的激愤与怒吼，这也是电影《战歌行》里最雄壮的背景音。

《战歌行》生动的故事情节真实感人。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片中“老烟锅”的琴声和“小眼镜”的慷慨陈词。老烟锅是“孩子剧团”里年纪最大的一员，他拉得一手好二胡，每次演出都是他给孩子们伴奏。在一次躲避敌人扫荡的大撤退中，剧团与鬼子遭遇，“老烟锅”为了保护孩子们，故意拉起胡琴将鬼子引开。当敌人循着琴声步步紧逼，他停下手中的琴弦奋起抵抗，最后和敌人同归于尽。深沉低回的琴音，在观影厅里久久回荡，冲击着每个观者的心扉。

尽管有流血，尽管有牺牲，但孩子剧团的成员依旧在演出。他们歌唱，他们呐喊，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支持和参与抗战。掖县演出的那晚，鬼子突然进村，他们将“小眼镜”绑在舞台上，让他说出谁是八路军。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一向文弱的“小眼镜”目光坚定、一字一句地说：“明天我们会过什么样的生活？我们住在一所大房子里，骑着崭新的自行车。学校里开满了花儿，孩子们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我们的衣服是暖和和干净的，早上吃鸡蛋，中午是打卤面，饭后再吃个水果，那是最好不过……”他的眼神里满是憧憬，仿佛他已看到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故事结尾，经历了战火洗礼的孩子们坐着渔船驶向了新的征程。此时，大屏幕上出现了一张泛黄的合影，这是1940年6月1日胶东孩子剧团反“扫荡”胜利后的合影，是孩子剧团的真实影像。那一张张稚嫩的脸庞啊，他们仿佛穿越了时空，就站在我们面前。我想他们一定看见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看到了六月的阳光下，所有孩子的笑脸！

李凤玲



火出圈的“村超”是文化交融的产物

最近在贵州省榕江县举办的“村超”乡村足球联赛引起了广泛关注，成为“爆款”。这一活动延续着榕江足球80多年的历史。这种“文化大集”式的“村字头”乡土赛事，以“土”出圈，紧扣“乡土”概念，以“文”赋能，借助“村超”这一特殊的赛事作为沟通地方的重要媒介，传递着独特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和民族观。榕江“村超”之所以火爆，笔者认为有诸多原因。

榕江特有的多民族文化交融在“村超”这一天得到集中展示。赛前各村代表身着异彩纷呈的民族服饰，吹着曲调优美的芦笙，跳着步伐轻快的舞蹈与足球运动员一起进入赛场。这些在民众日常生活中渐趋消逝的民俗文化伴随着“村超”的举办再一次获得了生机与活力，极大地调动起民众传承、传播地方文化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力助推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民众也在参与民俗仪式的过程中感受到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亲和联系，这不仅有利于地方文化的记忆和再造，其中关于各民族服饰文化、节庆符号、民俗仪式的挖掘、整合及转化也对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及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颇有助益。

作为一种构建村落文化的方

式，榕江“村超”内部凝结着共同价值、经验、期望和理解的意义体系。参加“村超”的球员来自苗族、侗族、水族、汉族、瑶族等各民族，他们中有摊贩、老板、司机、学生等。除了赛前挑着糯米饭、腌鱼、牛瘪等当地土特产入场的啦啦队之外，中场休息时展示的侗族大歌、苗族芦笙舞、民族服饰展示都进一步增强了参与“村超”民众的参与感与认同感。榕江“村超”可以说是在现代视域与社会秩序的规范下形成的具有新民俗内涵的节庆活动。

特别是舞者与观众手拉手跳起的“多耶舞”更是将全场气氛带入高潮。这种集歌、舞、乐三位一体的艺术形式提供了一种“内生性”动力，经由“开放性”与“共享性”的文化网络和“空间化”与“符号化”的民俗记忆集中展现榕江“村超”独特的归属感与凝聚力。宋代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就记载、描述了“辰、沅、靖”等地方的少数民族聚集跳“多耶舞”的盛况。参加榕江“村超”的人们借助“多耶舞”“吹芦笙”“侗族大歌”这些被“提炼”的文化元素，感受那些随着城市化进程已然逐渐消散的记忆。人们也能够与文化的“接触和体验”中，实现了自身审美需求的满足与重构。

在民俗文化展演与足球比赛的融合、发展中，榕江“村超”逐渐成长为“完整的”“可生长”的文化景观，并作为一种地方社会的书写方式嵌入民众生活之中，不仅吸引了身处异乡的游子，还有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足球爱好者。他们的参与凸显了全球化语境中民间内生力量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这类新型民俗节日中新旧景观空间的交叠、地域本土与全球化的相互编织，不仅加固了群体或个人的地方认同，也在物质景观属性、活动行为与文化意义层面，探索出了民俗文化展演与地方文化建构相互融合的创新路径。民俗文化在其中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发展态势，以完整性、真实性、情感性勾勒出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在这种新的共享和沟通之中，人们被带入一个有秩序的意义世界，在这里，人们作为创造者、传承者及传播者建构了自身的文化认同。新型民俗节日作为多元文化交融、交流、共生的场域，不仅可以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创造力及感召力，还可为铸牢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提供经验启示。这类以“土”出圈、以“文”赋能的“村超”不妨多一些。

选自《学习强国》